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經學文獻論稿

許建平 著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敦煌經學文獻論稿

許建平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敦煌經學文獻論稿 / 許建平著.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6. 4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 / 柴劍虹、張涌泉、劉進寶主編)

ISBN 978-7-308-15710-0

I. ①敦… II. ①許… III. ①敦煌學—經學—文獻—研究 IV. ①K870.6②Z126.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066719 號

敦煌經學文獻論稿

許建平 著

出品人	魯東明
總編輯	袁亞春
叢書策劃	黃寶忠 宋旭華
責任編輯	張小苹
責任校對	胡 畔
封面設計	項夢怡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興邦電子印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2.25
字 數	300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5710-0
定 價	38.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中心聯繫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浙江大學文科高水平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資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

[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編輯委員會

主 編 柴劍虹 張涌泉 劉進寶（執行）

編 委 （按姓氏筆劃排序）

王惠民 施新榮 柴劍虹* 張先堂 張涌泉 許建平

馮培紅 趙聲良 劉 波 劉進寶 盧向前

（加*者是本冊責任編委）

總序

浙江，我國“自古繁華”的“東南形勝”之區，名聞遐邇的中國絲綢故鄉；敦煌，從漢武帝時張騫鑿空西域之後，便成為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世界四大文明交融的“大都會”。自唐代始，浙江又因絲綢經海上運輸日本，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浙江與敦煌、浙江與絲綢之路因絲綢結緣，更由於近代一大批浙江學人對敦煌文化與絲綢之路的研究、傳播、弘揚而令學界矚目。

近代浙江，文化繁榮昌盛，學術底蘊深厚，在時代進步的大潮流中，涌現出衆多追求舊學新知、西學中用的“弄潮兒”。20世紀初因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流散而興起的“敦煌學”，成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中國學者首先“預流”者，即是浙江的羅振玉與王國維。兩位國學大師“導夫先路”，幾代浙江學人（包括浙江籍及在浙工作生活者）奮隨其後，薪火相傳，從趙萬里、姜亮夫、夏鼐、張其昀、常書鴻等前輩大家，到王仲華、潘絜茲、蔣禮鴻、王伯敏、常沙娜、樊錦詩、郭在貽、項楚、黃時鑒、施萍婷、齊陳駿、黃永武、朱雷等著名專家，再到徐文堪、柴劍虹、盧向前、吳麗娛、張涌泉、王勇、黃征、劉進寶、趙豐、王惠民、許建平以及馮培紅、余欣、竇懷永等一批更年輕的研究者，既有共同的學術追求，也有各自的學術傳承與治學品格，在不

同的分支學科園地辛勤耕耘，為國際“顯學”敦煌學的發展與絲路文化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浙江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者，成為國際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研究領域舉世矚目的富有生命力的學術群體。這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史上，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始創於 1897 年的浙江大學，不僅是浙江百年人文之淵藪，也是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英才輩出的名校。其百年一貫的求是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腳踏實地而又敢於創新的學者專家。即以上述研治敦煌學與絲路文化的浙江學人而言，不僅相當一部分人的學習、工作與浙江大學關係緊密，而且每每成為浙江大學和全國乃至國外其他高校、研究機構連結之紐帶、橋梁。如姜亮夫教授創辦的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原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1984 年受教育部委託，即在全國率先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培養了一批敦煌學研究骨幹；本校三代學者對敦煌寫本語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在全世界居於領先地位。浙江大學與敦煌研究院精誠合作，在運用當代信息技術為敦煌石窟藝術的鑒賞、保護、修復、研究及再創造上，不斷攻堅克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學的研究領域。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原語言文學分會基礎上成立的浙江省敦煌學研究會，也已經成為與甘肅敦煌學學會、新疆吐魯番學會鼎足而立的重要學術平臺。由浙大學者參與主編，同浙江圖書館、浙江教育出版社合作編撰的《浙藏敦煌文獻》於 21 世紀伊始出版，則在國內散藏敦煌寫本的整理出版中起到了領跑與促進的作用。浙江學者倡導的中日韓“書籍之路”研究，大大豐富了海上絲路的文化內涵，也拓展了絲路文化研究的視野。位於西子湖畔的中國絲綢博物

館，則因其獨特的絲綢文物考析及工藝史、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優勢，並以它與國內外衆多高校及收藏、研究機構進行實質性合作取得的豐碩成果而享譽學界。

現在，我國正處於實施“一帶一路”偉大戰略的起步階段，加大研究、傳播絲綢之路、敦煌文化的力度是其中的應有之義。這對於今天的浙江學人和浙江大學而言，是在原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傳承、發揚學術優勢的問題，也是以更開闊的胸懷與長遠的眼光承擔的系統工程，而決非“應景”、“趕時髦”之舉。近期，浙江大學創建“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舉辦“絲路文明傳承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邁出的堅實步伐。現在，浙江大學組織出版這一套學術書系，正是爲了珍惜與把握歷史機遇，更好地回顧浙江學人的絲綢之路、敦煌學研究歷程，奉獻資料，追本溯源，檢閱成果，總結經驗，推進交流，加強互鑒，認清歷史使命，展現燦爛前景。

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編委會

2015年9月3日

出版說明

本書系所選輯的論著寫作時間跨度較長，涉及學科範圍較廣，引述歷史典籍版本較複雜，作者行文風格各異，部分著作人亦已去世，依照尊重歷史、尊敬作者、遵循學術規範、倡導文化多元化的原則，經與浙江大學出版社協商，書系編委會對本書系的文字編輯加工處理特做以下說明：

一、因內容需要，書系中若干卷採用繁體字排印；簡體字各卷中某些引文為避免產生歧義或詮釋之必需，保留個別繁體字、異體字。

二、編輯在審讀加工中，只對原著中明確的訛誤錯漏做改動補正，對具有時代風貌、作者遣詞造句習慣等特徵的文句，一律不改，包括原有一些歷史地名、族名等稱呼，只要不存在原則性錯誤，一般不予改動。

三、對著作中引述的歷史典籍或他人著作原文，只要所注版本出處明確，核對無誤，原則上不比照其他版本做文字改動。原著沒有注明版本出處的，根據學術規範要求請作者或選編者儘量予以補注。

四、對著作中涉及的敦煌、吐魯番所出古寫本，一般均改用通行的規範簡體字或繁體字，如因論述需要，也適當保留了

一些原寫本中的通假字、俗寫字、異體字、借字等。

五、對著作中涉及的書名、地名、敦煌吐魯番寫本編號、石窟名稱與序次、研究機構名稱及人名，原則上要求全卷統一，因撰著年代不同或需要體現時代特色或學術變遷的，可括注說明；無法做到全卷統一的則要求做到全篇一致。

書系編委會

目 錄

我與敦煌學研究	(1)
敦煌經籍寫卷的學術價值	(9)
整理敦煌文獻時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35)
新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經部寫本殘頁錄校研究	(42)
敦煌本《周易》寫卷的學術價值	(65)
關於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周易正義》寫卷	(77)
唐寫本《周易經典釋文》校議	(85)
敦煌出土《尚書》寫卷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101)
由敦煌本與岩崎本互校看日本舊鈔《尚書》寫本之價值	(128)
日本舊鈔岩崎本《尚書》寫卷校證 ——兼論與敦煌寫本互證的重要性	(144)
日本舊鈔九條本《尚書》寫卷校證	(163)
敦煌《詩經》寫卷與中古經學	(177)
敦煌《詩經》寫卷研究綜述	(194)
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詩經》寫卷	(217)
英俄所藏敦煌寫卷《毛詩音》的文獻價值	(232)
試論法藏敦煌《毛詩音》寫卷的文獻價值	(245)
法藏敦煌《毛詩音》“又音”考	(261)
英藏敦煌《毛詩音》寫卷所見《毛詩》本字考	(289)

從敦煌寫本《禮記音》殘卷看六朝時鄭玄《禮記注》的版本	(307)
BD09523《禮記音義》殘卷跋	(334)
杏雨書屋藏《論語》殘片三種校錄及研究	(348)
評《敦煌〈論語集解〉校證》.....	(370)

我與敦煌學研究

我出生在浙江省慈溪縣(今慈溪市)的一個小村莊,童年恰值“文革”時期。與現在的孩子相比,我的童年可以說非常“快樂”,上學沒有任何壓力,讀書的目的就是識字,與前途無關。初中小學的九年,基本就是在玩耍。1979年,高二畢業,面臨高考,只是因為自己的理科實在太差,而記憶力尚可,就報了文科班。臨時抱了兩個月的佛脚,在懵懂無知的情況下,參加了第一次高考,名落孫山是意料中的事。但沒想到,我考了全班第一名,雖然離大學錄取綫還差了幾十分,但卻達到了入讀區中學長河中學高複班的成績。在高複班裏經過兩年的苦讀,於1981年考上了杭州大學歷史系。為什麼會報考歷史系呢?因為我的高考成绩,歷史分數最高,所以老師就讓我填報了歷史系。

我性格比較內向,不擅與人打交道,大學四年,一直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交往的同學不多,認識我的老師也很少。我比較喜歡看雜書,雜七雜八的書都會借來看,沒有中心,似乎也沒有什麼癖好。不過,現在想來,我的治學特點在那時已有所反映,我比較喜歡考據性的課,比如那時候開的古文字、考古學通論、歷史文選等課,都是我喜歡的。但是凡理論性稍強的課,我的成績就不好,無論如何就是記不住,也理解不了。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最喜歡給我們講“歷史文選”的魏得良老師。魏老師寡言少語,上課認真,一字一句地講解,這是我最喜歡聽的課。到撰寫本科畢業論文時,我就報了史學史方向,希望能由魏老師指導。但天不

從人願，系裏指定的指導老師並非魏老師。大概是欽定的老師不認識我，而我又不是什麼可造之才，欲求其門而不得，只能靠自己了。我定的題目是《論陸游的史學思想》，我人生的第一篇“論文”，是自己定題目，自己找資料，自己一字一句地寫。爲了寫這篇文章，在學校圖書館、系資料室泡了近半年，把陸游的《南唐書》、《劍南詩稿》、《渭南文集》、《老學庵筆記》等作品翻了好幾遍，摘了數百張卡片，寫出了一篇八千多字的論文。論文完成後，我的本科四年生涯也就結束了。

大三時，打算考研，我首先就去找魏老師，想考他“中國史學史”方向的研究生。很可惜，史學史專業兩年一招，我報考的這一年輪空，這樣就失去了繼續做魏老師的學生的機會。正當我考慮考研的去向時，與我同宿舍的80級學長周崇堅建議我報考本校古籍研究所，他給我講了報考古籍所的兩大好處，一是古籍研究所一屆招10人，名額多；二是學制兩年，可以早畢業，早就業。於是我就選擇了報考古籍研究所。其實古籍所是屬於中文專業的，對一個歷史系的學生來說，考古籍所比較吃力。由此我也花了大量的時間去旁聽中文系的課程，找中文系的書來讀，運氣好我考上了，成爲了古籍研究所1985級研究生。

當時古籍研究所招的是“研究生班”，學制兩年，碩士論文則到畢業以後在工作單位再寫，論文完成後回到原本求學的學校去答辯。在讀時並不像三年制研究生那樣有明確的導師指導，而是由研究所集體指導。由於沒有指導老師，加上自己未進學術之門，不知道該做什麼，也沒有想到應該拜入一位老師門下求學。所以這兩年的研究生生涯，與同宿舍的幾位室友結成了牌友、麻友、影友（大家都是研究生班的）。平時，翻翻雜書，《史記》、《漢書》、《詩經》、《禮記》、段注《說文》等，什麼書都拿來看，雜七雜八地看，看到看不下去時，就換一本來看，殺了不少的書頭。

兩年的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就要畢業了，但我還不知道碩士論文要寫什麼。我就向上一屆的學長楊自強請教（當時在寧波大學工作），他建議我寫“敦煌學”的論文，說這個做起來比較方便，只要找一個別人沒有研究過的寫卷，校勘一下即可。呵呵！此即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也。我問他敦煌學研究要找誰指導？他說找張金泉老師，他是做敦煌學研究的，於是我便去找張老師。張老師把我帶到資料室裏，從書架中拎出一捆複印材料，據他說這是從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複印來的一批資料，讓我在裏面找自己感興趣的寫卷。我翻一翻，裏面沒有一個東西是我碰到過的。我是個從來沒有跟學術研究有過任何接觸的學生，根本不知道現在學術界在做什麼事情，什麼東西是需要做的，我什麼都不知道。後來翻到一個《劉子》，我看到這個是子部的，之前我經史子集的書雜七雜八地也看了不少，而且看看這個也還有好幾張紙，我就說我先拿回去試試。接着就去資料室查王重民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看總共有幾個寫卷，然後又查關於《劉子》有什麼書。在資料室找到林其銑、陳鳳金寫的《劉子集校》（《劉子集校》也收了敦煌卷子），我就借回去跟敦煌《劉子》殘卷核對。核對了以後發現，《劉子集校》的校勘記中沒有什麼考證，我就跟張老師說我就做這個。這就是我做敦煌學的開始。

1987年7月，我從古籍研究所畢業，到杭州師範學院（今杭州師範大學）中文系工作，第一學期沒有安排我上課。我跟系主任張學誠教授說，我現在正準備做碩士論文，可能要到處跑、到處查資料，請別安排我太多的工作。其實系裏對新進教師大都安排當班主任，但系主任非常好，就沒安排我其他的工作，這半年就專心寫論文。

《劉子》一書傳世有很多版本，林其銑、陳鳳金伉儷所撰《劉子集校》廣搜諸本，博採異同，匯錄了自宋至清的三十三種傳世

刻本與前人批校本，也收入了四種敦煌寫卷，在《劉子》版本異文的匯錄上，可謂空前。但該書的重點是匯錄異文，並非校勘，大多數校語是過錄前人研究成果。我在看了《劉子集校》後，覺得作者誤考、失考者不少，仍有進一步研究的旨趣。於是打算以敦煌寫卷為底本，匯校各種傳世刻本，以補其缺漏，正其失誤。我首先想到的是根據《劉子集校》所使用版本的信息去核查這些版本。查閱圖書館的綫裝古籍，當然是遵循一個先近後遠的原則。於是我先查閱了杭州大學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的藏書，因為我畢業於杭州大學古籍所，當時又在杭州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在這兩個圖書館查書，還是比較順利的。接下來要去參訪的當然是離杭州最近的全國第二大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說到這裏，我要特別感謝當時的中文系系主任張學誠教授，當我向他請假，表示要去上海查書的時候，他不僅准假，還特批經費，支持我的這次訪書之行。

兩天的上海訪書之行，獲准閱覽了以下這些書：明萬曆六年吉藩崇德書院刊《二十家子書》本《劉子》，明刊《合刻五家言》鍾惺評《德言》，明歸有光輯《諸子匯函》中之《石匏子》、《雲門子》，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李寶沅纂《諸子文粹》本《劉子》。但幾種善本却没有能夠見到。因為有了上海之行的遭遇，我就不再去其他圖書館查閱版本，放棄了原先打算核查所有版本的想法。最後我的碩士論文是將十六種傳世刻本與敦煌寫本相對勘，這與《劉子集校》的三十三種相比，是嚴重不足的。但我的論文，重點不在於各種版本的異文羅列，而在於通過對異文的考辨，還《劉子》之原貌，合劉子之本意。現在想來，當時去重新對勘《劉子集校》收錄的各種版本純粹是多餘的工作，如果直接根據《劉子集校》提供的異文對《劉子》一書的異文進行校證，而不是僅僅校勘敦煌寫本《劉子》，做出來的論文將會更豐滿、更優秀。這樣，一方

面《劉子集校》所做的工作得到充分的肯定與吸納，同時也節省了很多時間與精力。當然這樣的結果，我與敦煌學的緣分也就極有可能擦肩而過，不會有這一本《敦煌經學文獻論稿》了。

當時，教育部有個規定，未參加過工作的剛畢業的研究生必須到地方上鍛鍊一年。本來按規定剛到杭州師範學院工作時就要去的，但我跟學校要求先讓我寫論文，第二年再去。所以我推遲半年，在1988年春季到了浙江淳安縣的唐村中學支教一年。唐村中學在很偏僻的深山裏，交通非常不便，如果去縣城排嶺鎮（今千島湖鎮）是沒辦法當天往返的。這一年裏我就帶了一些書去讀，主要是《十三經注疏》、《諸子集成》兩部書，有空時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因為《劉子》這書有個特點，它裏面有大量的典故，這些典故須從先秦兩漢的著作中去找。我就把群經及諸子一本一本地讀。凡看到書裏面有文句或語詞與《劉子》相關，我就把它添注在《劉子》那句話的旁邊。就這樣，我利用半年的時間，把帶去的書都翻閱了一遍，並完成初稿，暑假回杭後整理修改，完成了碩士論文。1988年9月，我回古籍研究所答辯，獲得了碩士學位。當然，答辯結束，我又回到唐村中學教書去了，直到1989年1月支教結束回杭。接下來就是按步就班地教書、看書，也常去古籍所辦公室轉轉，順便看看老師聊聊天。有一天，周啟成老師說他要申報一個課題，問我要不要參加？那時他打算要做的是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補編，他說我是做敦煌學的，認識俗字，比較適合做碑刻部分。於是我就開始收集資料，把一些與考古相關的書跟雜誌都找來讀，並抄錄與金石相關的資料。大概準備了一年多，周老師跟我說這個課題因為某些原因不再申報。我參加的第一個課題就這樣還沒正式開始就結束了。

後來有一次與張金泉老師聊天，談起現在沒事做。他說他們正在做一個省社聯的課題，叫“敦煌音義研究”，如果我願意的